

第七章 日本重新武裝与法西斯化

第一節 加强軍事、警察力量与 動員一切反動勢力

一 警察後備隊的創設

不論是個人或國家，在行動中遲早總會暴露出它隱藏在內心深处的真相和秘密的。戰爭是國家行動中最冒險的行動。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充當了“聯合國軍”也就是美國軍事基地的重要角色，於是過去以抽象的花言巧語欺騙人民的事實，也就全部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一九五〇年一月為麥克阿瑟所強調，又曾為吉田政府和自由黨以及其它方面所宣傳的日本“自衛權”的意義，現在已極具體地顯示出來這是作為日本重新武裝的第一個步驟。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僅隔兩個星期，即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指令吉田政府建立七萬五千人的“國家警察後備隊”，並將海上保安廳的名額增加八千人。為了使日本政府在國會中不致因違法挪用預算而遭受反對，為了使日本政府不必為籌劃經費而感到困難，麥克阿瑟不惜為此作具體的規劃，指令挪用債務償還費作為此項措施的臨時經費。這與佔領初期所發生的抽象的“民主化”指令，適成一個顯明的對照。

日本政府一接到這個指令，立刻就非常迅速地採取了行動。首先，為了避免受國會中民主勢力的任何阻撓起見，不採取法律形式而利用了“波茨坦政令”的形式。一九五〇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立即公布了“警察後備隊令”，並為招募志願者等等而大肆

宣傳，八月二十三日在全國業已有七千名第一批後備隊隊員，穿戴上了仿照美國兵裝束的隊服和隊帽。

日本政府過去接到關於“民主”政策的指令時，對於它的實行總是盡量加以拖延，相反地，這次在設立警察後備隊和加強海上保安廳的大事業上，為什麼又進行得如此巧妙呢？法令和規則的制定也許幾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僅以一個半月的時間就全部完成了隊員的徵募，特別是全部準備好了隊員的制服和武器，並把它輸送到指定的地方，却不是通常所能辦到的事。這暗示着設立警察後備隊的準備工作很早以前就在秘密地進行了。此外，麥克阿瑟總司令部戰史編纂室的舊日軍參謀們和韋洛比少將等所草擬的重新武裝計劃，一九四八年秋以來美國關於建立日軍和“利用人力資源”的研究，日本一九五〇年度預算案中國債費的激增，所有這些都是警察後備隊早已有充分準備的證明。一九五〇年初，服部卓四郎、鎌田詮三、有末精三、田中隆吉、河邊虎四郎、野村吉三郎等舊陸海軍將領、高級參謀、右翼團體及民主自由黨幹部等曾不斷接觸，商討重新武裝計劃，這在當時就已有具體的揭露了（見“續日本地下組織”，載於一九五〇年二月“真相”雜誌特輯）。當時不大相信這個消息的人，如果看到這些舊軍人們今天也正是武裝計劃的中心人物的這一事實，大概再不會懷疑所揭露的基本事實的真實性了。

這樣迅速編成的警察後備隊，在一九五〇年底配備了美國所“借與”的卡賓槍和機關槍，成為純粹是美國式的輕武器裝備的四個步兵師。“借與”的武器有損壞時需要賠償，至於武器的管理，直到最下層機構都是由美軍掌管的。於是在武器管理的名義下，也就“管理”了部隊本身。代替師團司令部的“管區本部”，第一處設於東京，第二處設於札幌，第三處設於舞鶴，第四處設於福岡。在全國以大隊或聯隊為單位設立了三十七個兵營，這是按照美軍用語叫做兵營的。他們的訓練是由美軍將校

和下級軍官用英語夾雜着一兩句日本話來指導進行的。

海上保安隊也根據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波茨坦政令”，將名額由一萬人增加為一萬八千人——不包括事務職員在內——將它所保有的船舶（艦艇）由二十五艘大量增加至二百艘，排水量由五萬噸增加至八萬噸，並新設立了海上保安大學及海上保安訓練所，也就是海軍士官學校。

警察後備隊是非常殘酷的處所。根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管轄後備隊的大橋國務大臣在國會的發言，當時有一千名隊員因肺部患病而被“解僱”。三個月以前還是身壯力強的青年，現在則面黃肌瘦地回到鄉村去了。過去天皇的軍隊雖然封建冷酷，但至少還負責把害病的隊員送往軍用醫院治療，而警察後備隊連這一點也不做。它是按照美國現代化的“理論”來解僱和開除他們的，即“病人不能使用，對不能使用的人就不發給薪水並叫他滾出去”。最初因貪圖五千日元的月薪以及服務二年後退伍時還能拿到六萬日元退職金，所以許多人都狂熱地應募。但因大家逐漸知道了上述實際情況，並日益擔心被送往朝鮮代替美國兵充當炮灰，於是，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這一年之間，竟出現了一萬人以上（佔全部人員的百分之十四）的退隊者。而為了補充這一萬名缺額，曾徵募志願者，但這一次全國只有三萬人報名。

政府一直說警察後備隊不是軍隊，完全是維持國內治安的“警察”。即使在理論上，警察與軍隊之間也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不過這裏姑且不論；但僅就上述的師團配置、美軍對它的指揮和訓練、以及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季編成後備隊以來的歷史來看，顯而易見，警察後備隊就是第一批的殖民地軍隊。它首先是為了鎮壓日本國民爭取和平與獨立的鬥爭的軍隊，其次是為了補充美國帝國主義的軍隊。麥克阿瑟本人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在美國國會說：日本的警察後備隊是做照美國軍隊編制的，“與其

說它是單純的警察力量，不如說它是警備軍”；並且當議員詢問這種警察後備隊“能否轉變為強大的保障國際安全的軍隊”時，麥克阿瑟“很有把握地表示同意”，並回答說：“那是很容易的事”。不僅如此，他還曾考慮過如何把警察後備隊派遣到朝鮮作戰的方法。

問題不在於後備隊是否是軍隊或警察，重要的是在於它究竟是什麼性質的軍隊。首先，如上所述，就其成立的歷史來看，其次就其編制、指揮命令系統以及裝備來看，無疑地後備隊就是供美國統治者使用的殖民地僱傭軍。警察後備隊的一切裝備全部依賴美國，這不只是經濟上的問題，而且是政治上的問題，這意味着日本沒有指揮這個軍隊的權利。不僅後備隊的訓練是美國式的，而且各兵營的隊長即使是日本人，他也沒有實權，而在警察後備隊編制之內的、充當“顧問”的美國將校或下級軍官才是真正的隊長。警察後備隊隊本部的長官和次官雖然是日本人，但長官室的隔壁就是外國人的辦公室，一切事情全在那裏決定。美國議員和麥克阿瑟所說的“強有力的國際軍隊”的後備隊，它的實質就是如此。

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季以來就主張為美國而重新武裝日本的漢森·鮑德溫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曾說：“美國不得不期望西德和日本供給為应付世界各地局部戰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因此，美國必須及早締結對日單獨和約，使日本擔負其‘防衛’的責任和提供軍事基地，並應以‘聯合國’的名義來組織日本和其它國家的軍隊”（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朝日新聞”）。與漢森·鮑德溫同樣很早就熱烈主張日本重新武裝的艾契柏克中將在一九五〇年年底毫不掩飾地說：“美國軍隊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軍隊，而日本人則是最廉價的陸軍。”、“只要天皇陛下下一道命令，立刻就可建立二、三百萬的精銳軍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新聞週刊”雜誌）。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前來日

本的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羅森堡說：“我对日本警察後備隊的關心，是出發於人力資源的觀點。我們信賴後備隊，將來也是這樣”（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總之，自始至終，就是為美國提供人力而已。這就是警察後備隊、同時也就是重建日本軍隊的最主要的基本特徵。

警察後備隊和日本的重新武裝第一是為美國充當殖民地僱傭軍，第二是為日本壟斷資本、天皇制官僚，地主惡霸以及其它反動勢力充當對內鎮壓人民、對外企圖復活帝國主義野心的一種工具，這一點也是必須加以重視的。這些反動勢力早就渴望准許它們重新建立軍隊。資本家把重新武裝和戰爭當做他們獲取利潤的最佳辦法，日本國會議員在投降後不久就肆無忌憚地對美國人說：“西伯利亞將滿足新民主日本的一切需要”（馬克·蓋因：“日本日記”，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記）。本來日本軍部和政府都認為：即使要投降，也只是對美、英投降，並不曾打算對蘇聯和中國投降。現在它們認為期待已久的機會終於到來了，於是開始大肆宣傳重新武裝。日本參議院議長佐藤於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說：如果“聯合國軍”招募志願軍時，日本人可以應徵（報紙曾大肆刊載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美國參議員馬格納遜在參議院提出准許招募日本人為美軍志願兵的法案）。如果突如其來地說要重新武裝，勢必遭到國民的反对，因此，先宣傳任何國家都有“自衛”權利，或必須“獨立自主”“保衛國土”，就成為自由黨和民主黨（以及麥克阿瑟）所採取的推進重新武裝的戰術（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星期每日”週刊）。過去說“還不到談論重新武裝的時候”或“不從事重新武裝”的吉田首相，現在他也說“正在考慮自衛的方法”了（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這裏所謂方法不外乎承認美軍長期佔領日本，提供軍事基地；總而言之，就是後來成為“美日安全條約”的具體內容以及日本本身的重新武裝。

在这种情况下，前首相蘆田均便非常率直地提出了重新武裝的主張。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他就重新武裝日本的办法向美軍總司令部提出了意見書，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他在他的故鄉發表演說會力陳重新武裝的必要。他說：“爲了重新武裝，本來最好是修改憲法，但要修改憲法就得經過國民投票。顯而易見，親身體驗到戰爭悲劇的許多婦女对此勢必加以反对，投票的結果大概不能免於失敗。估計到这些情况，憲法的修改必須再等待一個時期。代替修改憲法的妥善办法就是各政党採取一致步調，接受單獨‘媾和’條約，在‘聯合國’的支持下進行武裝。”據新聞記者報道，蘆田關於重新武裝的論調：“並不是忽然心血來潮，而是在相當長的時間与各方面联系和徵求意見之後，才認爲最大公約數是建立十五個師，共二十万人”（同上“星期每日”週刊）。如此看來，所謂“自衛”“自衛”云云，只不过是日本方面來响应上面所引用的漢森·鮑德溫的言論而已。他們所能做的事情也不可能超出這個範圍。因爲，爲了日本的“自衛”，首先就必須撤退一切駐在日本的外國軍隊。既然他們不主張這樣，那麼不管名義如何，讓外國軍隊駐在日本，並在它的指揮下（所謂在“聯合國”指揮下實際上就是在美國指揮下）建立日本人部隊，不言而喻，这只是把日本人当做“人力資源”而已。

日本舊職業軍人和各種右翼集團認爲蘆田和吉田的重新武裝計劃过分依賴美國，於是稱他們爲“親美派”，因而這些軍人和集團拿起重新武裝計劃夢想再走復活“大日本帝國皇軍”的道路，但這種計劃在目前也不過是夢想而已。

二 警察力量的增強

与建立後備隊同時，警察本身也大爲增強了。例如允許稅關官員攜帶武器（根據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改後的稅關法），賦予鐵路公安人員在鐵路設施內与司法警察有同樣的权

限，並准許他們攜帶手槍（同年八月一日）。九月三十日設立了“出入國管理廳”作為外務省的外局；藉口所謂“鑑於朝鮮事件以後非法入境者激增”，並設置了出入境審查官和警備官，還准許他們攜帶和使用武器，以便強迫為日本政府所討厭的朝鮮人撤離日本並執行如同司法警察的取締“非法”入境者的職務。這不外是以新的規模大力復活了過去的“特高警察”的“外事科”和“朝鮮科”而已。

於是這就陸續新設和加強了不屬警察法範圍的警察，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法務府特別審查局的大規模擴張。作為法務廳特別審查室而成立（一九四八年二月）的特別審查局是過去特高警察變相的東西，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特別審查局的編制起初不到一百五十人，以後年年按幾何級數的速度急劇增加，朝鮮戰爭爆發前夕增至五百三十七人，戰爭爆發後八個月增至一千二百人，一九五一年度補充預算時增加到三千人，在一九五二年度預算中又增加到五千五百人。特別審查局在法律上並不是警察，特審事務官完全沒有警察官所具有的權限，然而，他們擅自使用如下的文件，從事警察也無權進行的家宅搜查和查封沒收。

“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譯者）×月×日

法務總裁 大橋武夫

××××先生

禁止日本共產黨宣傳教育部發行的黨的活動方針的出版

根據昭和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暨同年七月十八日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致函內閣總理大臣的兩項指令，命令無限期停止所有日本共產黨機關報及其代替報紙或同類報紙的發行，本人奉內閣總理大臣之命執行上述措施，特此傳達執行。”

在這個文件的任何字句中也並未賦予特別審查局人員

以搜查人民住宅並隨意拿走東西的权限。然而，特別審查局人員就憑着這張紙條來襲擊人民住宅，從床下到天棚到處搜查，任意搶奪，甚至連公開出售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或單人像片也都沒收了。當人民抗拒這種非法行為時，特別審查局人員便傲慢地說：“你該知道我的手就是麥克阿瑟的手，這是麥克阿瑟的命令，它勝過日本的憲法”。如果再繼續抗拒非法搜查，就將成為妨礙執行公務的現行犯。這就是美國式的吉田“民主主義”的實質。這不是比過去特高警察更惡劣的警察專制是什麼？

一般來說，警察的品質是日趨惡劣，他們威脅着基本人權。甚至根據法務府的調查，自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九月止，法務府受理的侵犯人權案件達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件，其中五百三十八件實際上係由警察等特別公務員所犯的案件，這裏面包括“暴力侮辱”案一百三十八件，致傷致死案八件。連法務府也承認，警察侵犯人權“表現了極顯著的增加趨勢”。不容忽視的是，此外還有幾十倍，不，幾百倍如啞吧吃黃連無處伸冤的案件。而警察的變成獨斷行事者則是他們的主子法西斯化的具體表現。

隨着特別審查人員即特高的加強，中央集權的警察也加強了。一九四八年麥克阿瑟以得意的花言巧語形容中央集權的警察說：“如同過去它在日本封建時代所表現的那樣，今天它也是近代集權主義獨裁制度的顯著特徵”。於是麥克阿瑟指令改變舊的警察制度，將它分為國家警察和地方單位警察，要警察必須作“國民的公僕”。但事實上日本警察從沒有一次當過國民的公僕，也沒有作過這樣的努力。警官學校教務長弘津恭輔在他所寫的“致新警察書——國家與警察”這本警察教科書中（一九四八年出版），就正面否認了公僕精神。他說：“據稱新憲法下的警察精神，是由‘天皇陛下的警官’轉為‘公僕的警官’。我不能理解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主張警察仍然“要服從天皇

陛下的聖心”，並應遵循“作為天皇陛下的警官的理想”。麥克阿瑟對這樣的警官學校一句話也沒有譴責過。此外，照理說中央集權的警察應已不存在了，但事實上，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禁止全國集會和示威遊行時，却運用了中央集權的力量動員了國家警察和地方警察。

等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則在法制上也明確規定了警察的中央集權化。首先規定了市區以外的自治警察可以由居民投票加以廢除。因為地方自治單位財政苦於警察費的開支，於是，自由黨、民主黨以及其它地方惡霸在該法律公佈後，立即進行富於煽動性的宣傳說：如果撤銷警察就可以減輕賦稅的負擔。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底止，日本全國一千三百十四個鎮、村的自治警察中，決定撤銷的達一千二百十四處。然而鎮、村的財政負擔並沒有因此而稍有減輕。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削減了相當於警察費的平衡財政津貼所致。只有徹底廢除國家警察和地方警察而採用民警制度，才是改善地方財政和維持鎮、村居民治安的方法。顯而易見，即使做不到這樣的地步，至少要廢除國家警察和警察後備隊，把這筆費用分配給地方政府，並以民主方式選舉公安委員。實際上，一九五一年一月的全國市長會議也曾通過了要求撤銷國家警察的決議。但政府不顧這些民主要求，卻把國家警察的名額增加了五千名，原則上是把被撤銷的地方自治警察吸收到國家警察中去。不僅如此，還規定如經縣長要求，國家警察即可在地方自治警察管區內行使職權。於是中央集權的警察這樣一來就變得穩如泰山了。

首相吉田和自由黨之所以對“行政整理”特別熱心，它的真正意圖就是在從事上述的重新武裝和加強警察力量。他們藉“行政整理”之名，一方面把社會福利和文化教育等和平民主事業費用縮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則把預算和人力集中在軍事、警察以及徵稅問題上。這些軍事、警察和徵稅機關是受外國控

制的，而一般殖民地國家機構的形態也或多或少就是如此。關於這種官僚機構的軍事化和附庸化，從預算中的官吏編制名額來看，一方面是一般職務的行政官吏或通訊、鐵路、專賣等國營事業的員工年年減少，另一方面是只有特別職務的國家警察、後備隊和稅務官員等則在顯著地增加。

一般會計的編制名額（單位：千人）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一般職務	225	217	177	155	151	149
特別職務	149	205	280	269	356	354

特別會計的編制名額

郵 電	487	436	443	405	406	412
國 鐵	607	604	627	500	498	469
專 賣	33	36	41	38	41	40
共 計	1,619	1,599	1,677	1,458	1,539	1,519

上表係根據平野義太郎：“日本和平經濟的考察”。

三 反動勢力的總動員

在加強軍事和警察力量的同時，各種反動勢力都開始總動員了。當共產主義者、工會活動家、進步的知識分子和愛好和平的人士被奪去職業，被奪去言論機關，遭受各種迫害的時候，五年前作為戰爭負責人、極端國家主義者等等“不歡迎的人物”而被整肅的人們却陸續重新出現了。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對曾經請願要求解除整肅的人，大批解除了其中一萬零九十名的整肅。同年十一月八日，以甲級戰犯被判處了七年苦役的重光葵，以刑期已逾四分之三，且服役

態度良好爲理由，被釋放出獄。同年同月三十日又有三千二百九十七名正規軍人被解除了整肅。預定計劃是派他們來充當警察後備隊的幹部。一九五一年五月，駐日美軍總司令李奇微准許日本政府對於根據佔領軍命令所發出的政令重新加以考慮。因此，日本政府立即進行大規模的解除整肅。六月解除了七萬人，八月又解除了包括四千多名舊軍人在內的一萬三千人的整肅。這樣一來，與禁止和平集會同時還使戰犯重新出現了。於是，除與軍事方面有關者外，一般被整肅者幾乎都被解除了整肅，剩下的僅有一千人左右，而這些人也逐漸地被解除了整肅。因總司令部特別命令而被整肅的鳩山一郎也恢復自由了。此外，與解除整肅的同時，還放寬了對被整肅者各種活動的限制，放寬了對教員和工會人員的整肅，撤銷了和財閥有關係的職員的就業限制，還大大放寬了對舊特高警察以及保護觀察所職員等的就業限制。

曾經暫時不敢露面的戰前右翼團體也陸續出現了。主要的右翼團體有“日本革命菊旗同志會”（戰後較早成立的右翼團體）、“大和黨”（一九四九年三月成立，以曾經在駐華特務機關工作的人員爲核心）、“新生日本國民同盟”（一九五一年五月成立，以舊紫山塾頭子本間憲一郎爲核心的舊右翼團體，主体有前大將真崎甚三郎、前中將根本博以及其他舊軍人，並連結了“勤皇忠誠會”、“大日本生產黨”、“愛國社”以及由蘇聯歸國的軍國主義者組成的“太陽梯團”等團體）、“協和黨”（一九五一年八月成立，以故石原莞爾領導的東亞聯盟等爲核心）以及前東亞聯盟系統的“民族新生運動”等；至於其他以前右翼團體法西斯分子的個別活動以及其他小團體則是不勝枚舉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東京新聞”報道，將近二千個右翼團體在特別審查局進行了登記。

如同戰前那樣，這些右翼團體都是以反蘇反共擁護天皇制

爲最高綱領的。唯一的不同是，戰前它們以反英美主義爲其重要的招牌，但現在則与此相反，已變成了美軍權力的忠實奴僕。其中某些團體的活動，例如民族新生運動等，標榜着民族主義，似乎也主張擺脫美國的統治而完全獨立，但它們並不採取要佔領軍即“駐日軍”立即撤退和廢除美日“安全條約”及“行政協定”等爲實現民族獨立的具体行動。本來它們只不过是依靠着承擔帝國主義暴力統治的一部分任務而存在的，因此，它們甚至不可能主張純粹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從前，它們是日本軍部的外圍團體，現在它們已得不到如同從前軍部所給予它們的援助了。然而國內外的壟斷資本家們却給它們以援助和鼓舞。資本家似乎也了解利用舊右翼團體來破壞現代的羣衆運動是沒有多大效果的，但仍然讓舊右翼團體扮演這樣的角色，如亂打罷工工人，或以恐怖手段對待羣衆革命鬥爭的領導人物等等。只靠這些來破壞現代的羣衆運動委實是太不濟事了。所以國內外的統治者們要求從羣衆組織內部進行破壞。以市井流氓分子爲核心的舊式右翼團體已不能勝任這個任務了。於是必須在各項工作崗位、工會和農民協會中培養執行這項任務的人。“愛國工人運動”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被培養的。

民主主義者應該特別警惕的現代日本法西斯羣衆組織，就是這種“愛國工人運動”。這是由國營鐵道工會的法西斯分子頭目星加要等所組織的團體。起初，它們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勾結，在工會、農民協會“民主化”的口號下，進行分裂工作，驅逐了真正有戰鬥性的工會幹部。可是後來，即使在“民主化同盟”所控制的工會中，不管工會幹部的意圖如何，在工會會員羣衆鬥爭力量高漲的壓力下，它們也不得不與政府和資本家進行某種程度的鬥爭。於是，星加要等人在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等職業反共分子和西尾末廣、淺沼稻次郎以及其他社會黨右派幹部的秘

密領導下，並取得“國策紙漿”公司經理水野成夫等大資本家的援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組成了“青年獨立同盟”。國營鐵道民主化同盟極右派、日本工會總同盟書記局、社會黨書記局、農民黨青年部、石川島造船廠、日立製作所龜有工廠等的一部分青年是該同盟的最初的核心。它們是以暴力破壞工會及進行各種挑撥行為為任務的純粹法西斯行動隊。甚至連社會黨正式機關報“社會新聞”，也抨擊它是“隱藏着極其危險的極右傾向的政治團體”（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當一九五〇年初發生電氣產業爭議時，“青年獨立同盟”喧嚷要“保衛”豬苗代電源免遭共產主義者的破壞，其實它們是想如同松川事件似地進行誣蔑捏造，預備在自己破壞以後再把它們的罪行轉嫁於共產黨和自由工會，企圖藉此對共產黨和自由工會進行徹底破壞。

朝鮮戰爭爆發後，“青年獨立同盟”及其夥伴，在政府和資本家的庇護下，結合着職務等級制，加強了以人民為唯一對象的半秘密結社式的活動。然而即使在它們活動中心的國營鐵道工會中，由於工人羣衆的反对日益高漲，一九五一年六月星加要等雖然在新潟舉行的國營鐵道工會大會上，主張從運動方針中刪除和平四原則（即全面媾和、反对軍事基地、反对永久中立和反对重新武装），但却以一百十三票對二百九十二票的比率遭到一敗塗地。不僅如此，民主化同盟組織亦因此而解散了。星加要說：“出於愛國精神的工人運動是會受鎮壓的”，於是他鼓吹所謂“愛國工人運動”，並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在濱松舉行了“保衛組織同盟”的成立大會。據稱：該同盟的成立是為了挽救解散民主化同盟而產生的“工會危機”和“日本的危機”。該同盟綱領的第一條，否定馬克思主義；第二條，為實現以人的革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第三條，排斥“階級至上主義”；第四條，資本主義由於其內在矛盾而必然崩潰的論調是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我們相信國家的機能可以統制和調整資本，應以世界

各國合作爲目標，逐漸變成幸福的國家”；第五條，反對“偏倚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第六條，實現“日本民族獨立”；第七條，“中立主義”成了蘇聯的爪牙，“我們要根據積極的和平主義與‘聯合國’合作”；第八條，“祖國日本的資本，將來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要參加經營，積極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利益”；第九條，反對工會進行政治鬥爭；第十條，統一工會；第十一條，使工會成爲工會會員的工會。

上述綱領的條文是既無理論又無用處的亂七八糟的文字。總而言之，它的意圖是絕對支持帝國主義國家（第四條），向美國一邊倒（所謂“民族獨立”也要不妨礙與“聯合國”即美帝國主義的“合作”，實際上則是屈從。第五、六、七條），爲了擁護資本主義（第八條）而推進反蘇反共的政治鬥爭（第九條）。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二日兩天在大宮國營鐵道工業機械部舉行了“國營鐵道工會新生民主化同盟全國代表會議”，決定了幹事長齋藤鉄郎以下的幹部。同在九月一日“青年獨立同盟”改稱爲“青年懇談會”；九月七日上述“國營鐵道新生民主化同盟”、日本工會總同盟、全國纖維產業工會同盟（簡稱“全纖同”）等十幾個工會的極右派領導人組織了“民主工人運動研究會”（簡稱“民勞研”），而成爲“愛國工人運動”的總司令部；專事分裂“總評”和擾亂、挑撥工會內部。有人說“愛國工人運動”是工會的“產業報國會”化運動，它們企圖使工會成爲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工具，就此點而言，的確可以說是“產業報國會化”了。但是必須着重指出，它正在被培養成爲比“產業報國會化”更危險的買辦性法西斯政變的基本部隊和破壞工會的法西斯突擊隊。

正同賣國的破壞工會運動經常假“愛國”之名而出現一樣，隨着右派和法西斯組織的復活和新生，也公開復活了右派法西斯的意識形態，並從事“愛國”心的煽動。一九五〇年八月，吉田首相和天野文部大臣與文教審議會委員馬場恒吾、高橋誠一郎、

安倍能成、小泉信三、和辻哲郎等人舉行座談，認為当前的急務是養成具有“真正愛國心和有志做國家棟樑的健全思想的人”。十月二日吉田又在新聞協會說：“文教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復興純正而堅強的愛國心”，藉以“防止過激的思想和行動”。所謂“純正的愛國心”是与“愛國工人運動”以及赤尾敏領導的“大日本愛國黨”等的“愛國”是一樣的。顯而易見地，這種所謂“純正的愛國心”是以變日本為美國的軍事、經濟殖民地，使日本人代替美國兵充當炮灰為光榮的心；同時，它的精神就是对反对殖民地化和代替美國兵充當炮灰的國民施以恐怖行為的暴力團體精神。

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國最大壟斷資本家洛克菲勒為調查“慈善事業”和“交流美日文化”与杜勒斯媾和使節團同時來日。他究竟在日本調查了什麼？據說“由於他的任務的性質是什麼也不能發表的”（特克斯脫：“在日本的失敗”）。但毫無問題，在這種極秘密的“慈善”和“文化交流”中，他一定有向日本鼓吹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工作。他还研究了如何振興“茶道”和“插花”的方法。對美國來說，日本半封建的“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它的頂點就是天皇崇拜——不僅不可怕，反而是美國利用日本所不可或缺的東西。

由於文部省的半強迫命令和家長教師聯誼會首腦的強迫要求，於是自一九五〇年九月新學期開始以後，中小學校掛“太陽旗”和唱“君之代”^①逐漸盛行了。與此同時，“神道”也復活了。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的英文“日本新聞”敏銳地揭露了戰爭与恢復神道之間的關係。該報說：“當兩個世界之間燃燒着戰火的時候，曾經成為日本戰爭貴族們武器的神道，正在穩步地恢復由於投降而喪失的地盤”。於是新成立了以厚生大臣黑川武夫之妻擔任會長的“神道婦女會”，以及“神道青年全國協議會”等團

① 日本戰前的國歌。——譯者

体，“神道青年全國協議会”原來不过是宗教法人却打着好像是官廳名称的神社本廳的招牌的宗教团体——事实上它是前內務省神社廳的战後版，“統轄”着全國的神社——它在“童子軍”幹部講習会中也插了一手。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成立的“伊勢神宮祭祀年遷宮奉贊会”，實際上等於是强制進行神道活動。成立該会的目的是爲了在一九五四年以前籌集總額達五億二千萬日元的“祭祀年遷宮費”，會長爲參議院議長佐藤尚武，顧問或理事爲經濟团体联合会會長石川一郎、日本銀行政策委員宮島清次郎等大資本家，“朝日”“每日”“讀賣”三大報社社長以及其他舊貴族和神官，該会通过全國市、鎮、村的惡霸分子，實際上是採取了强制捐款。

軍國主義和崇拜天皇是復興神道和吉田所提倡的愛國心以及洛克菲勒所鼓吹的國粹主義的焦點。一九五一年六月舉行貞明皇太后的葬禮時，首都東京所有的學校不用說，就是工廠和營業場所也都被迫默禱致哀。雖然任何人也沒有公開發出命令，但毋庸置疑，事實上是有着權力者的統一命令的。它們動員學生參加出殯，強迫沿途的居民清掃出殯的道路。在舊金山締結單獨“和約”後，更加强推進這種“愛國心”的培养。報紙上會大力宣傳吉田首相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參拜“靖國神社”[⊖]的消息。儘管“首相個人”參拜神社是他的自由，但實際上他的目的是恢復國家神道，並首先從恢復祭祀供奉戰死者的神社開始。文部大臣天野曾於一九五一年十月起草“國民道德實踐綱領”，認爲天皇是國民道德的中心（這是把教育敕語中的“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一段話用“民主”筆調改寫的），並把這個綱領作爲“僅供參考”的文件，以文部大臣天野貞祐個人名義發給了各學校校長。雖然口頭上說這是“僅供參考”，而實際上是強迫

⊖ 靖國神社是祭祀戰死者的神社。——譯者

執行。这种办法是日本的統治者在投降以前並不知道的，而是美國佔領軍对日本政府所經常使用的手段。國民道德的教條要通过这种帝國主義的虛偽的和欺騙手段强制实行，也就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階級道德腐敗的深度了。它們爲甚麼要如此苦心孤詣地來復活天皇主義呢？回答是很簡單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講过，美國之所以保存天皇是爲了利用它來作爲統治日本的工具，当它們愈益迫切需要徹底利用日本、日本人以及天皇作爲美國侵略戰爭工具的時候，美國認爲將日本國民与天皇結合起來提高天皇的权威是最有效的办法，而對於吉田政府來說也是如此。

第二節 “美日經濟合作”

一 美日經濟合作的意義

隨着朝鮮战争的開始，日本產業淪爲美國軍需產業的包工，日本貿易从屬於美國的世界政策以及日本農業淪爲殖民地的兵站，这些情况都有了飛躍的發展。一九四九年由道奇路綫鋪平道路的、在朝鮮战争前从緊急的軍需產業部門所開始实施的工作，現在是全面地徹底地在進行了。而这件事情美日統治集团把它叫做“美日經濟合作”。过去当日本帝國主義不可一世的時候，它們高唱“日滿經濟合作”或“日滿華經濟一体化”，如果用“美”字代替“日”字，用“日”字代替“滿”或“滿華”字樣，對於這個“美日經濟合作”的真相也就大致可以懂得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下旬，杜勒斯來日強迫吉田接受美國關於媾和的意圖（見後述）。當時杜勒斯与麥克阿瑟進行了會談，並对美國政府報告說：“麥克阿瑟關於必須製訂日本能够爲西歐的重整軍備計劃生產何種物資的名單，並將其提交美國政府一事，也与我（杜勒斯）意見一致。我們並一致認爲必須儘速復興日本軍事基礎有貢獻的日本經濟力量”。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上述方針決定“無限制地供給日本原料，使之生產輔助性的軍需物資”。

日本資本家把美國的這一決定當作天降福音似的寄以期望。繼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美軍總司令部經濟科學局局長馬貴特發表了與本國政府協議後所製訂的“美日經濟合作”具體方案。這個具體方案使日本資本家們大失所望。因為它強調“美日經濟合作”是建立在“商業基礎上”的。如果是真正的“商業基礎”——等價交換——也就罷了，但是，日本資本家很能了解美國式的“商業基礎”就是保證美國壟斷資本獲得超額利潤的掠奪基礎。事實上，例如日立製作所根據這個“基礎”最初生產的“新特需”總額雖達十八億日元（據該公司發表為四十三至四十五億日元）之鉅，但原料係美方供給，日立製作所只收加工費，而美方則把日立製作所要求一小時六角美元的加工費壓低到四角八分美元。

此外，馬貴特聲稱：“美方擬考慮在日本設立一個全面調整採購一切物資的機關，它主要是為了統一美方的需要，並與日本政府交涉以便處理工業計劃和動員問題”。因為這等於說把日本工業作為美國戰時生產計劃的一部分來製訂計劃並進行動員，所以，這樣赤裸裸地招出了美國的意圖的例子也是罕見的。

日本工業由於這種“美日經濟合作”而淪為美國軍需生產的包工，可由如下情況窺知一斑。“美軍總司令部對五百人以上的工廠企業的生產能力曾再度進行調查，原來根據美軍總司令部備忘錄作為指定工廠者[⊖]總數達八百六十九所，包括範圍很廣，其中有飛機工廠（一百八十七所），鋼鐵工廠（二十一所），軍火工廠（二十一所），工作母機工廠（九十所），軸承工廠（二十七所），硫酸工廠（二十三所），蘇打工廠（十九所），電力廠（二十所），造

⊖ 指定工廠係日本投降後指定撥充賠償之用的軍需工廠。——譯者

船廠(二十四所),陸軍工廠(五十所),海軍工廠(四十六所),研究所(四十一所)等。特需訂貨是集中在从这些指定工廠中挑選出來的設備完善而又有能力的工廠,其餘的工廠則成爲包工工廠或成爲轉包工工廠。日立製作所接受的十五億日元的所謂新特需,其中的百分之八十都轉包給其他工廠,同時並使所屬的日立工廠成爲独立的工廠,其中所有人員則幾乎全採取了臨時工的形式。承造新特需的價格一經轉手就更加便宜,如日立製作所的承造價格爲美金四角八分,但一轉到包工工廠的富士工業就降低到美金三角八分了。”

“華盛頓一方面把‘美日經濟合作’的原則放在这种‘商業計算’的基礎上,同時它還表明要根據如下五個條件來決定資金、資料的範圍。

(一)製造美國政府的軍需物資;(二)製造供应駐日美軍的軍需物資;(三)製造供应日本警察後備隊的軍需物資;(四)製造換取原料所需的輸出品;(五)製造日本國內所需的物資”(高野實:“對日媾和与今後的勞工運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版)。

不僅工業如此,交通和運輸也是以美國即“聯合國軍”的軍事運輸爲首要對象的。昨天以前還是过剩的船舶,朝鮮戰爭爆發後竟立即感到不足了,於是急忙用美元對等資金——爲美國所控制的資金——來建造船隻。在鐵路方面,朝鮮戰爭爆發後,立即在國營鐵道的二萬五千輛運輸貨車中爲美國軍事需要保留了一萬二千輛。於是使日本人民和平生活物資的輸送大感困難。

美國爲了控制日本經濟而採取的強迫命令辦法,在根據“波茨坦政令”強迫將電力事業劃分爲九區這一點上最露骨地表現出來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佔領軍幾乎未曾運用過“禁止經濟力量集中法”,但關於電力事業,却根據該法始終要求將日本發電公司分別設在九個地方。日本大資本家在這個問題上的

利害矛盾是相当複雜的，他們強烈地反对“劃分”，並且即使要“劃分”，關於如何“劃分”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也不一致。電氣產業工會認為“劃分”是“不顧電氣事業的公共性而有碍日本的恢復和產業的復興的。因為各個地區的電費差別很大，‘劃分’後將導致地方產業走向毀滅的道路；同時，也將延遲電源的開發”。此外還判斷“劃分”必然引起解僱、降低工資和加強勞動，因而在一九五〇年春天與工資鬥爭相結合進行了反对“劃分”的激烈鬥爭。

由於各方面的矛盾和反对，日本第七屆國會（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將政府根據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而提交國會的“改組電氣事業法案”以及其他有關法案都擱置起來了。接着於一九五〇年七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召開第八屆臨時國會時，雖然美軍總司令部又要求政府成立上述法案，但政府沒有把握可以压制國會的反对，終於沒有提出該項法案。於是美軍總司令部橫施壓力，決定在該法案成立之前不准將美元對等資金貸放為開發電源資金，甚至也不准公司用自己的資金進行開發電源的工程（這是美元對等資金如何控制日本經濟以及政治的典型例子）。日本政府对这种压迫毫無抵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儘管當時第九屆臨時國會正在開會之中，而日本政府竟根據麥克阿瑟的命令發出“波茨坦政令”，決定將電力事業劃分為九區。美國佔領軍為什麼要如此強迫實行“分割”電力事業呢？如果是為了提高生產，“劃分”不僅不必要，反而是有害的。儘管如此，佔領軍之所以要求“劃分”的最終目的無非是為了強制施行所謂“分而治之”的一切專制統治的原則而已。因為如果把煤炭供應不足的日本的最重要基礎產業加以“劃分”，並在有利可圖的地區導入美國資本而掌握了控制權，那末它就可以利用較小的資本來控制日本的電力事業，並進而控制日本的全部產業。

很早以前美國就通过外匯管理以及其他措施使日本貿易从屬於它的利益，朝鮮战争的爆發更進一步地加强了这种情况。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日本与中苏之間的貿易幾乎是全面地被禁止了（由於实施了巴特爾法）。理由是因爲中國援助北朝鮮，所以不应給予任何“战略物資”。一切機器和金屬品自不待言，就是紙張和海產品也不能出口。另一方面，日本工業基本原料的鐵礦砂和煤炭則必須遠自美國或加拿大購買。日本从中國購買焦煤（製鐵用煤）每噸僅需十一美元，而現在不得不用三十一美元从美國購買；日本从中國購買鐵礦砂每噸爲七美元，而現在不得不用十八美元从美國購買。如果加上運費支出的虧損，日本經濟由於被禁止与中苏進行貿易而蒙受的損失真是無法估計的。

美國当局和吉田政府說：对中國貿易沒有什麼了不起，現在日本可以依靠東南亞市場和“美日經濟合作”就大有可爲。然而，明治以來日本資本主義是依靠中國市場才發展起來的。鄰近日本擁有五億以上人口、現在在人民政府領導下人民生活穩定和蒸蒸日上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廣濶無垠的市場，並且是日本可以通过和平貿易增進中日兩國相互間利益的絕好友邦，這是無可辯駁的明顯事實。事實上，說对中國貿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吉田之輩，正因爲他們十分了解中國市場的無限價值，其所以反而要追隨美國，向美國一邊倒，是企圖最後依靠战争來恢復過去“大日本帝國”对朝鮮、中國东北等地的殖民地統治。它們放棄了独立的日本与中國之間的善鄰友好的和平關係，選擇了从屬於美國而進行战争和恢復殖民地統治的道路。

二 “經濟復興”的真相

在这种“美日經濟合作”体系下，日本經濟必然是矛盾百出極端畸形的东西。乍一看來朝鮮战争似乎是大資本家的“神

風”。估計朝鮮戰爭前夕日本無法出口的存貨計達六百億日元乃至八百億日元，日本船隻的二分之一共約八十萬噸沒有生意可做。朝鮮戰爭剛一爆發，存貨一搶而空，約三十萬噸船隻為美軍所租用，不但沒有空船，而且無論造多少船也不敷使用。例如東日本重工業公司經理等人興高采烈地說：朝鮮戰爭爆發以來，“我們立即按照二十四小時一直幹下去的命令（與美軍）進行合作”（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讀賣新聞”）。如果補充一句說：“二十四小時一直幹下去”的不是經理而是工人，那麼這位經理的話豈不更正確地道出了事實嗎！

自朝鮮戰爭爆發至十月底止，包括物資和勞務的美軍特種需要（特需）共達一億三千六百四十七萬美元（四百九十一億日元），其後每月均有增加，到戰爭將近一年的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特需”的訂貨合同總額約達三億一千五百十八萬美元（一千一百三十五億日元）。

由於“特需”的推動，日本工礦業生產有了迅速的上昇。戰爭開始那一月的生產指數為戰前（以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為基準）的百分之九三點六，一年以後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五一年七月已達百分之一四一點八，成為戰後最高紀錄。同一時期，全部製造工業則從百分之九一點六增加到百分之一四三點三（參看下表）。

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

（以 1932—36 年為 100，美軍總司令部調查）

	1950年6月	1951年7月	1951年11月
礦工業生產	93.6	141.8	138.3
礦業	111.5	129.9	126.7
製造工業	91.6	143.3	139.5
金屬	131.2	222.2	183.6
機械	103.8	219.9	202.9
水泥	105.6	147.1	148.8

纖維	39.8	56.0	59.2
化学	123.3	175.5	164.1
電氣・瓦斯	186.0	210.2	196.9

隨着“特需”生產的發展，日本大壟斷資本的利潤也有了急劇的增加。如果將一九五〇年度下半年與一九四九年度下半年的利潤率加以比較：三大鋼鐵公司（八幡、富士、日本鋼管）增加了二十八倍；三大礦產公司（太平、神岡、古河）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四大紡織公司（鐘紡、東洋紡織、大日本紡織、富士紡織）增加了七倍；五大化學纖維公司（公司名稱從略）增加了二十倍；四大貿易公司增加了十一倍。龐大的資本是沉醉在所謂“糸邊”“金邊”^①的景氣之中了。

然而，這種生產的上昇完全是畸形的。這種上昇主要是由於金屬、機械、水泥和化學工業生產的上昇而造成的。一九五〇年六月纖維工業的生產指數僅為戰前的百分之三九點八。儘管朝鮮戰爭爆發後歌唱“糸邊景氣”，但一九五一年七月纖維工業的生產指數仍不過是戰前的百分之五六。從就業工人數字來看，戰前（一九三四——三六年）紡織業就業工人佔全體就業工人的百分之四四點二，而一九五一年則減少到百分之二四點四。這不僅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礦業和動力生產的“恢復”乃至“上昇”，這不僅主要由於礦業以及重工業的上昇所造成的，而且意味着日本產業機構毫無改變地繼續保持着太平洋戰爭年代的戰時機構，到最近日益加強了它的軍事性——作為美國軍需產業的包工工廠——所以這種生產的恢復並未穩定和提高國民的生活。這從我們親身的經驗中最容易體會的例子就是電力生產。一九五一年的發電量為四百億瓦時以上，遠遠地超過了日

① “糸邊”係指纖維和紡織工業，因它們的每個字都是糸字旁；“金邊”則指金屬工業和礦業，理由亦同。——譯者

本投降前三百四十八億瓩時（一九四三年）的最高發電量，甚至於夏天乾季也有三十億瓩時左右的電力。然而這些電力的大部分都是供應美軍設施和美軍家屬，或大軍需工業的需要，因此，一般日本人家庭和民需生產感到電力供應不足，而苦於比太平洋戰爭時期更為頻繁的停電。報紙和廣播不斷從事愚弄國民的宣傳說：停電是由於雨量不足而引起的，其實是因為“雨”[⊖]下得過多才停電的。

經濟恢復的偏跛狀態也表現在下列情形上：工礦業生產雖然迅速上昇，但農業生產不僅沒有達到戰前水平，而且比戰前水平還低百分之一。毋庸贅述，其所以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美國把它的農業恐慌轉嫁與日本，強迫日本以高價輸入超過需要量的糧食；日本政府不但完全不採取提高國內農業生產的政策，還通過虛假的土地改革保存了農村封建勢力的統治和剝削，堵塞了提高農民生活與農業的道路。此外，日本政府一方面以惡霸勢力為支柱，另一方則通過徵糧、徵稅和剪刀差等等實行了破壞農業的政策。

甚至在貿易方面恢復得異常緩慢的英、法、意以及西德，它們的進出口貿易也都是與工業生產相平行而恢復的。它們的工業生產較日本工業早一年半至二年就達到了戰前水平，它們的貿易在一九五一年就超過了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二〇至三〇。雖然日本工業生產由於美軍“特需”的刺激而漸漸達到了戰前水平，但是貿易仍不及戰前的二分之一。一九五一年度的輸出包括“特需”在內也不過是戰前的百分之三六，輸入僅為百分之四九。貿易恢復得這樣低且與工業生產的恢復極不均衡的原因是：第一，因為業已恢復的生產，完全是作為美國軍需包工的生產，而

⊖ 日文“雨”（アメ）字的讀音與日本對美國人的諱稱同音，此處係雙關語。——譯者

它又是畸形的；第二，因為日本貿易被迫與中國切斷關係，被迫以高價和昂貴的運費從美國購買大部分的進口物資，被迫將大部分的出口物資轉向容量狹窄的東南亞市場。

美國帝國主義通過美元對等資金和對一部分企業（如對於石油業）的直接投資而控制了這種極端畸形的軍事經濟；於是工業原料也要依賴美國供應，製成品的銷售首先也要仰賴美國的“特需”；同時，由於外匯管理和巴特爾法的限制，日本全部貿易受到了美國的統制並成為它的附庸。美國帝國主義對日本經濟進行這樣的控制，固然具有從日本榨取最大限度利潤的經濟目的，但更重要的意義是：把日本作為美國侵略朝鮮、中國和蘇聯的遠東中心基地，在軍事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經濟。所以，美國要用佔領軍或駐日軍的武力來保障這整個的體系。

在完全從屬於美國的殖民地軍事經濟下的“特需景氣”，正像前面所說的一樣只是有利於少數巨大的壟斷資本家，而對於勞動階級、中小資本家和和平工業來說則只是意味着加深了它們的犧牲和痛苦。例如上述的日立製作所“新特需”合同，它首先要保證美國壟斷資本的最大限度利潤，其次要讓日本壟斷資本獲利，然後還要讓包工資本家獲利；因此，勞動強度勢必加劇，勞動條件不得不趨於惡化。日立製作所在簽訂“特需”合同的同時，甚至使用美國憲兵和警察的暴力，強制解僱了五千五百名熟練工人，而另行雇用了六千名臨時工人。這就是在有“特需”存在期間，以最低工資殘酷使用工人的情況。日本所有的產業部門，所有的工廠和作業場所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這種傾向。所以到處都在增加臨時工而減少固定工人。此外，連臨時工也當不上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的數目已超過一千万人（統治集團注意到這一事實，認為要建立多少軍隊就可以建立多少軍隊）。而由於“特需”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一九五一年三月的物價較朝鮮戰爭前平均高漲了百分之六七，但全部製造工業部門的平均工

資僅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和平產業和中小企業受到了犧牲。它們得不到資金和電力的供應。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雖然壟斷資本獲得了較之過去高出二十倍、三十倍以至一百倍以上的利益，然而所有公司組織的公司和銀行，其一九五一年度的平均利益只不過是一九五〇年度的二倍。這說明了中小公司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遭到了損失。此外，規模更小的個人企業在一九五一年度的所得，則較一九五〇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經濟白皮書”）。這種矛盾勢必引起恐慌，關於這點，我們將在後面加以敘述。

三 地主制度的加強

日本農業的進一步殖民地化以及農村半封建統治勢力的加強，與城市產業淪為美國戰爭經濟的包工工廠和重新武裝問題是具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的。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立即於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提倡所謂“增產糧食的興農運動”；雖然口頭上說，其目的是為了戰時的糧食自給，但它不但不解決增產糧食的根本條件即滿足農民對土地的需要，使農民確保耕作權以及穩定農民生活，反而採取了與此完全相反的政策。

由於朝鮮戰爭，首先使一九五〇年麥子的徵購有所“追加”，換句話說，就是要增加徵購量的比率。這一年麥子的徵購，預定數額為八百二十七萬日石，在縣長會議上，由於縣長方面堅決要求削減二百七十萬日石，所以政府一方面答應削減縣長方面所要求的半數一百三十四萬日石，同時卻又決定超額徵購同量的一百三十四萬日石。這是根據美軍總司令部的強硬命令。於是日本政府就憑藉所謂“美軍命令”企圖把農民自用麥也一粒不剩地搶光，強制執行了“徹底徵購”和“賠本徵購”。農民組織較強的栃木、茨城、山梨、愛知和兵庫等縣的農民，對這種強奪是不容

易听从的，因此，佔領軍人員乘吉普車直接到各村督促徵購。在朝鮮戰爭開始前甚至曾說要撤銷徵購麥子制度，但爲甚麼又開始這種做法呢？那就是要把日本的麥子運到美國佔領下的朝鮮去的緣故。農林大臣廣川在第十屆國會答覆共產黨議員竹村的詢問時供認了戰爭以後已向南朝鮮出口了六萬噸麥子。但在另一方面，却強迫日本進口價格既高而又難吃的外國米。這種情況与日本帝國主義以朝鮮和中國東北爲殖民地時，掠奪朝鮮農民生產的大米送往日本，而迫使朝鮮人吃東北雜糧的情形是相似的。因此，日本農業地位也是被規定在美國對東方統治的體系中的這一事實，再沒有比這種情況表現得更明顯了。

戰爭又使得農產品價格与肥料等農業用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大大增加。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爲一百，一九五〇年六月的農產品價格爲九六點二，農業用品價格爲九六點七，大体保持着同樣的水平；然而，戰爭爆發一年後的一九五一年七月，前者爲一二〇點七，後者爲一三八點一。只要有下列情況存在，即從國外輸入超過必需量的糧食，國民大眾購買力日益降低，以及壟斷資本榨取最大限度利潤，那末就必然要產生這種結果。

農村經濟的破壞給警察後備隊——即重新武裝和警察的加強提供了它所必需的“人力資源”。現在，自由黨等正四處演說宣傳，說是重新武裝旨在救濟農村中不是長子的青年[⊖]——不過它們到底不敢把這種話登在正式文件上。雖然也有些單純的青年以爲這話有點道理，但這是顛倒是非的，它是爲了重新武裝而破壞農村，並迫使不是長子的農村青年認爲只有加入警察後備隊這一條路可走了。

爲了強制執行等於徵用的徵購以及把農村作爲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的根據地，就必須加強農村半封建地主的統治勢力。

⊖ 日本僅長子有繼承財產權，所以次子、三子必須出外謀生。——譯者

按照過去的慣例，農業恐慌一方面成爲趨向農民革命的轉折點，另一方面又使貧困的農民更加依賴惡霸，從而加強了他們的統治權力。解除整肅對於農村來說，在復活惡霸統治勢力問題上會起很大的作用的。因爲農村的情況不同於中央政治舞臺和大資本家集團，在農村中，舊人員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

如上所述，一九五〇年九月頒佈的、關於廢除統制土地價格而僅僅統制土地轉移的“波茨坦政令”，也就是企圖擴大反動勢力在農村的經濟地盤。農地委員會書記在報告當時農村情況時曾舉例說：“最近由於有不少地主造謠說，和約簽訂後日本將自行掌握政治，土地法也要轉而有利於地主，因此自耕農惶惶不安”，又說：“因爲波茨坦政令的頒布，一般農戶發生了誤解，以爲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地主可以奪回出租土地，於是未經農地委員會的同意就轉移了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權”（近藤康男：“土地改革的諸問題”）。其實，日本政府正是爲了要強制實行這種“誤解”才頒佈該政令的。

結果，土地的轉讓，僅就合法進行的來說，也有迅速的增加。所有權轉讓案件在一九四九年度有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件，一九五〇年度有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一件，一九五一年度（推算）有九萬一千八百七十件，形成了幾何級數的增加。轉讓耕地的面積雖然沒有像上述比率那樣顯著地增加，但一九四九年度爲七千九百十八町步，而到一九五一年度已增加爲二萬一千零十五町步了。一九五一年度土地轉讓案件的百分之七十一是買賣關係，而在一九四九年度以前的土地轉讓則全是由家族繼承，所以兩者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如果調查一下關於土地買賣雙方的情形，則據官廳統計，出賣者多半是自己不從事耕種的地主或零星兼業農戶（半無產階級），而購買者多是租賃該地的佃戶。日本政府和美國大使館的職員（變相的佔領軍民政局）等說：土地買賣的盛行，並非舊的寄生地主制度正在大規模地復活，反而是

土地正在集中於實際上從事耕種的中農，所以土地改革並未倒退而是正在向前發展着（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朝日新聞”）。

然而，農民却不這樣看。即使是在“佃戶”購買土地時，也有偽裝的佃戶，也有黑市的買賣。並且也有這種例子，即藉地主和原來的佃戶“共同”耕種為名，而實際上則是恢復了租佃制度。還有像以前那樣出租三町、五町土地而能收入一半地租的寄生地主又在復活之中，但上述土地買賣的顯著增加，顯示着土地結果是集中於有錢人的手裏——如果農民不堅決抵抗時——的趨勢已很明顯地產生了。過去的大地主惡霸，雖然因土地改革而喪失了田地，但此外它並沒有喪失其它任何東西。他們有的成為山林主，有的控制着水利灌溉，有的變為批發商和商人，有的變為高利貸者等等，同時又以擁有一町步以內的土地出租者身分，仍然保持着對農村的控制勢力。而“波茨坦政令”則推動了這些大地主惡霸，使他們作為增長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爪牙的威力的工具。因此，農民就敏感地警惕着地主在“媾和”後的公開復辟。

由於農業委員會法的制訂和實施（一九五一年三月），農村惡霸勢力在組織機構方面也得到了鞏固。根據該法，農地委員會、農業調整委員會以及農業改良委員會等制度廢除了，而這些委員會所辦理的一切業務，概由新成立的農業委員會辦理。在農地委員會中，佃農所佔的委員人數與地主及自耕農合計起來所佔的委員人數是相等的，雖然這只是在制度上擴大佃農的發言權，但現在連這種偽裝民主的外衣也棄置不顧了。農業委員會分設在市、鎮、村和都、道、府、縣。市、鎮、村委員不是由逐層選舉而是由全村選舉十五個人，此外，再由市、鎮、村長根據過半數當選委員的推薦選任五名“具有學識和經驗者”來擔任委員。原來的市、鎮、村、農地委員可以作為“具有學識和經驗者”加以選任，但基本上以不選任這批人為原則。都、道、府、縣委員，由選

舉產生者爲十五名，規定市、鎮、村委員有選舉權，而當地任何農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有一反以上耕地的經營者和與之同居的親屬）均有被選舉權。此外，再加上由縣長選任的委員五名。

只要看這個選舉法便能清楚地了解農業委員會係農村惡霸對於耕地和農業的統治機構。再進一步就它的工作內容和權限來看，這個委員會不僅是辦理過去農地委員會等所辦理的工作，而且還可以辦理“關於斡旋土地等利用問題以及防止爭議事項”。於是掠奪土地就是這樣很容易地得以合法化了。一九五一年土地買賣事件有了顯著的增加，這也與這種機構從中起作用有關係的；它不僅是在農村，而且是在日本全國普遍走向反動、農民貧困和農業破產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不考慮這種情況，也就難於正確地抓住它的歷史意義。也只有有了這種鞏固的專橫的地主勢力，才能強制施行形同掠奪的虧本徵購。這一切都可以說是農村接受單獨“媾和”的準備措施。

在犧牲工人、農民和中小企業家的利益以及犧牲和平產業和發展貿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龐大軍需產業的“特需”景氣，由於財富積累和貧困加深兩者的急劇演變，於是隨着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國“經濟衰退”即恐慌的到來，也早已開始出現了恐慌的現象。一九五〇年底的“系邊景氣”和“金邊景氣”消失了，以“系邊暴跌”尤其是化學纖維的暴跌爲首，物價開始猛烈的下跌。由於一九五一年六月馬立克提議而開始的朝鮮停戰談判，使得美國資本家們叫嚷“和平恐慌”，而這給予美國附庸的日本的打擊就更爲嚴重。它的表現是繁榮衰退，生產減低，銀根吃緊，貿易不振和存貨增加等。至於恐慌的犧牲則被盡量地加在中小企業和勞動羣衆的身上。大資本家和吉田政府爲了擺脫這種恐慌，愈益加深了對美國的依賴，並選擇了依靠美國和日本本身的擴張軍備以求掙扎的道路。

第三節 法西斯化的進行

一 加緊整肅赤色分子和“總評”的成立

日本國內外的統治勢力爲了強制執行戰爭和殖民地化的政策，於是對正在爲日本的和平、獨立、民主和生活而鬥爭的國民組織，特別是對它的前衛日本共產黨和共產主義者，進行加倍的鎮壓。朝鮮戰爭的前夕，它們整肅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並與戰爭爆發同時，命令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報”停刊。此外，並陸續迫使地方性的和內部刊物——油印的支部新聞停刊，將羣衆政治新聞“文化時報”、“民主日本”、“自由”和“和平之聲”等非共產黨的機關報視爲赤旗報的“後繼報紙”或“類似報紙”而接連地迫使其停刊。這些報紙的發行人或編輯自不必說，甚至連販賣者也遭到全國規模的逮捕和下獄。而統治勢力還假借停刊處分之名，不根據法院的拘票就擅自搜查住宅。朝鮮戰爭爆發了一年多以後，截至一九五一年七月爲止，這些被迫停刊的報紙達一千七百三十七種。我們看到這個數字，一方面可以知道鎮壓是如何的徹底，同時也可以知道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力量之強大。

原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翻譯小說“查特利夫人的繼承人”，被當作邪淫書籍而禁止發行。接着發行人和譯者被起訴，毫無疑問，這是剝奪言論、發表自由和恢復檢查制度的第一個步驟，這與對赤旗報等的鎮壓不是沒有關係的。

作爲無產階級工會的結合體並與世界工聯有密切關係的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三十日根據“團體等規正令”被命令解散，十二名幹部遭到整肅並被禁止擔任公職。在所有的職場所日益加緊地在強制進行“整肅赤色分子”。首先是從報紙通訊廣播機關開始——可見統治者是多麼害怕人民知道真實情況——並波及電氣產業、電影、交通運輸、煤炭、金屬礦

山、私營鐵道、車輛、造船、鋼鐵、汽車、印刷出版、電氣工業、化學、機械、電綫、非鐵金屬、糧食、纖維、木材、醫療等所有產業部門。截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為止，已有一萬零八百六十九人，因不容於資本家而被視為“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而遭到整肅撤職。同時，國內外的統治者曾積極地動員了大批武裝警察隊來協助資本家。政府本身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整肅赤色分子尚感不足，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又從農林省二百零七名職員開始，把通商產業省、電氣交通省、運輸省、郵政省以及其它政府各機關職員共計約六百名當做共產黨員或其同情者，用各種藉口加以整肅。

工人階級對於整肅赤色分子的抵抗，進行得不够十分有力。三鷹、松川事件以來的鎮壓和工会的分裂，削弱了它們的抵抗力量。但這並不是說完全沒有進行抵抗。例如京都井上電機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中小企業，就曾進行激烈的反對鬥爭，並終於迫使資方取消了解僱。井上電機公司在這次鬥爭中，有五十一名工人遭到警察的非法逮捕，但是，全体工会會員（四百名）團結到底，終於取得了勝利。在大企業中，如東日本重工業公司下丸子工廠、百恩縫紉機公司和關東電機工業公司等的工作人員也發揮了前所未見的力量。

特別是在工人“背上貼着號碼、胸前帶着証章而被迫在不可想像的監視環境下勞動”的美軍直接管理的軍需工廠——東日本重工業公司下丸子工廠（擁有四千工人），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發表了整肅赤色分子四十五名後，被解僱者和全体工会會員一致不予承認；十月二十三日早晨，被解僱者在同地區工会代表等約三百人的聲援下，正預備進入工廠時，曾與約二百名武裝警察隊和美軍憲兵進行了一場大搏鬥，有的工人竟被美軍憲兵的吉普車撞倒了。最後，工人方面撤退到附近的北辰電機工廠，在警察隊包圍下召開了工廠代表會議，在“用日

本人的手來保衛日本產業”的口号下，鞏固了以大田區工聯為核心的聯合鬥爭體系。另一方面，在工廠內部，全體工會會員根據工會執行部的“以實力進行反抗的鬥爭”的方針，舉行了投票，其中有一千四百一十四票贊成，一千三百九十四票反對，二百九十一票棄權。但因有人認為投票用紙不備，於是在次日（二十四日）再度舉行投票，然而在这次投票中，贊成票數增加到一千八百四十六票，反對票數則減少為一千二百七十九票。同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把工會執行部人員叫去，命令他們“在任何場合都不准罷工”。於是在十月二十八日又舉行了第三次的全體工會會員投票，这次投票結果依舊是一千七百七十四票對一千三百二十票，重新確定了以前兩次的決議。其後約一個月的期間，截至十二月二日鬥爭告一段落時為止，工人在美軍直接管理的軍需工廠這種艱難的環境之下，仍繼續以實力與官方進行了對抗。這種勇敢的鬥爭雖然沒有能夠取消整肅，但是“它給全國反對整肅赤色分子的鬥爭運動以很大的力量，在這一點上，得到了頗高的評價”（全國金屬產業工會機關報“工人”和“日本勞動年鑑”，二十四集）。

統治集團也企圖在學校裏進行整肅赤色分子，並且也部分地進行了；然而學生對於這種整肅所進行的強而有力的反對鬥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美軍總司令部教育顧問意爾斯博士到東北大學準備進行煽動反蘇、反共和在學校進行整肅赤色分子的演說的時候，學生們高喊“意爾斯不要再講”、“意爾斯住口”而拒絕了他的講演。以此為導火綫，在全國學校裏掀起了反對殖民地化教育和保衛學術思想自由的大規模學生運動。

一九五〇年秋天，與產業界的整肅赤色分子相配合，對學校也要進行整肅時，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與工會共同進行了反對鬥爭。特別是東京都“學聯”指令都內全部大學於十月五

日舉行總罷課；九月二十五日，法政大學學生拒絕了考試；二十八日，早稻田大學學生舉行大會時與十個中隊的警察發生了衝突；二十九日，新制東京大學拒絕了考試，並與侵犯學校的警察隊發生了衝突。十月五日，有十一個大學，三萬九千六百學生參加了罷課。這種學生運動的力量迫使大學方面未能按照文部省等的計劃對教職員進行整肅赤色分子。

與“整肅赤色分子”同時，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十二兩日，舉行了由民主化同盟集合而成的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正式成立大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代表也曾出席該會旁聽。一個多月後，“總評”的幹部島上善五郎就朝鮮戰爭問題發表了談話，認為以美軍為主的干涉為“聯合國的警察行動”，指出工人要協助“聯合國”，致力於“特需”生產和軍事運輸，並稱“赤色分子將由工會自行清除”（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讀賣新聞”）。“總評”的幹部好像也了解整肅赤色分子勢必擴大為整肅粉紅色分子，並發展到對一切工人運動的鎮壓，所以它們反對藉整肅赤色分子之名來鎮壓民主的工人運動。但日本及國際勞工運動的歷史早已屢屢證明了：如果一旦承認共產黨員是可以鎮壓的鎮壓原則，早晚就不得不承認對一切階級運動的鎮壓。當島上發表上述聲明時，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布拉蒂自誇說：“有人說總評是總司令部的工具，假使這是事實，我們引為非常榮幸”。“總評”事務局長高野實在一年之後的著作（“對日媾和與今後的工人運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版）中寫道：“對工人運動的破壞和控制，首先是鎮壓和孤立共產黨的工人運動以及團結其餘的工會勢力。因此，當‘總評’成立的時候，它們（美軍總司令部和政府）以為這是它們的功績也是理所當然的”。

實際上，美軍總司令部把民主化同盟和“總評”的組成“以為這是它們的功績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不管是整肅赤色分子或鎮壓和平運動，如果沒有右翼社會民主主義領導人的積極協

助，而僅依靠統治集團的暴力，是絕對做不好的。例加八幡製鐵所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改選工會幹部時，公司方面曾協助“民主化同盟派”進行活動，當改選獲得成功後，公司就立即開始與工會的“民主化同盟派”幹部進行集體談判（在這以前停止與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答應支付獎賞金；同時，並於十一月一日整肅了二百三十名工會的積極會員。民主化同盟的任務典型地表現在電氣產業工會之中。該工會自己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先於公司進行了對工會會員的赤色分子整肅。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布拉蒂對於這件事發表意見說：電氣產業工會“開始做到日本任何工會從未做到的事，這是值得祝賀的”；又說：其他工會仍然把整肅赤色分子的責任，“放在政府或資方身上，這對於工會本身來說，是深為遺憾的事”。但是從日本民族的前途來看，究竟是受帝國主義者的祝賀好呢？還是被它認為遺憾好呢？

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竭力使工會變為它們“引為非常榮幸”的工具，同時，對於右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抱著很大的希望。民主黨蘆田均在一九五〇年底提交美軍總司令部的關於反共及重新武裝的意見書中，曾率直地寫着這種希望：“當共產黨舉行暴動和勞動攻勢高漲的時候，首先和它對立的是穩健的勞動階級。當政府以全體勞動階級為敵時，就極難在對付共產黨上獲得實際效果。在這種場合，日本社會黨的協助就成為極其必要的”。

社會黨右派幹部們是怎樣成為蘆田等人的好朋友，這從他們不僅曾與蘆田等共同出席內閣會議，甚至曾共同進過巢鴨監獄的事實看，已充分可以證明了。因此，壟斷資本也公開以資金來援助社會黨。根據自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四月提交全國選舉監察管理委員會的對政黨的捐款單，對社會黨的捐款總額達六百九十三萬日元，其中包括八幡製鐵所、日本硫酸銨工業協會、帝國石油公司等各五十萬日元。在這張捐款單裏，社會黨左派領袖和田博雄也捐獻了六萬日元，社會黨左派領袖鈴木茂三郎雖

然要出席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會議[⊖]，但他與和田同樣慷慨地捐出了五百萬日元。和田與三井財閥等所組成的、表面是社交團體而實際是操縱政界的集團“番町會”有着密切關係（時岡坦：“政黨資金是由誰拿出來的”，見“人物往來”雜誌，一九五二年二月號）。

二 鎮壓的擴大

到了一九五一年，法西斯鎮壓早已超過了以“整肅赤色分子”或防止共產黨暴力革命為藉口的階段，而發展為對一切和平、民主和獨立運動實行鎮壓了。第一件重要的事實就是一九五一年三月從國會中開除了共產黨議員川上貫一。他在國會的質問演說具體而詳盡地揭露了日本殖民地化、軍事基地化的事實，因此，自由黨、民主黨狼狽不堪，終於開除了川上。議員由於在國會內的發言而被開除，過去在進行太平洋戰爭時，作為天皇制裝飾品的國會曾有過開除齋藤隆夫和西尾末廣的先例，而今天作為麥克阿瑟裝飾品的國會，也由於開除川上而自己說明了它已進入戰時體制的事實。

第二件重要的事實是，在五一勞動節禁止使用人民廣場——皇宮前廣場。戰後的日本全國勞動人民每年均曾統一慶祝五一勞動節，而一九五一年終於連這個五一勞動節也遭到了破壞。縱然是由佔領軍和政府培養出來的“總評”所主辦的五一節，但是幾十萬工人聚集於美軍司令部與皇宮之間的廣場上這件事本身，已成為政府和佔領軍恐怖的焦點。法西斯主義並不表示資本主義的強大，而只表示它的脆弱，這話確實是很有道理的。凡是要求和平、反對軍事基地和主張全面媾和的人們，不論

⊖ 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會議(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是右翼社會黨的國際會議。一九五〇年六月在哥本哈根舉行，污蔑共產主義，並決議各反共國家要進行合作。——譯者

他們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全被視為“苏联的爪牙”。一九五〇年八月，甚至連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紀念日前夕的和平節也被禁止了。一些大的報紙和雜誌不能刊載坦率地主張全面媾和、報道日本現狀及呼籲民族危机的文章。“世界”雜誌出版媾和問題專刊，使主張全面媾和的進步的大学教授和自由主義評論家等一齊發表了意見；这在給以後的新聞界開闢了道路上是具有很大的意義的，然而這也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舊金山“單獨和會”業已開幕的那天才開始出刊的。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一日，公布了三鷹事件第一審的判決。在被告和日本人民為要求公正審判而進行鬥爭的而前，審判官也不得不斷定檢察官認為該事件是由於共產黨員等的共謀而發生的說法是毫無事實根據的“空中樓閣”，宣判該事件係被告竹內的個人犯罪，處以無期徒刑，並判決飯田以及其他全部被告一概無罪。然而檢察官仍然堅持虛構捏造的罪名並提出上訴。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公布了第二審的判決，這次判決也否定了共謀罪名，並沒有推翻第一審關於無罪部分的判決，但是認為對竹內的無期徒刑判處過輕，應處死刑。審判官們是利用反動氣氛的囂張，企圖通過這次判決來恫嚇工人。檢察官對此項判決仍感不滿，堅持全體被告均應有罪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竹內被告對這種不合理的判決也提出了上訴。

通過裁判而對民主勢力進行恫嚇，这在松川事件上表現得更為殘酷無理。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福島地方法院認為鈴木信、阿部市次和杉浦三郎三人為共謀事件的主謀犯，本田昇和佐藤一為實行犯，並均判處死刑，認為武田久、二宮丰、赤間勝美、高橋晴男和大田省次五人為共謀事件主謀犯或實行犯，均判處無期徒刑，對其餘十名被告也判處共達九十五年六個月的徒刑。當宣讀判決時，全體被告對於處理證據的極端歪曲非常憤慨，因而提出了激烈的抗議。於是，審判長竟採取了暴戾措施，強迫命

令全体被告退庭，而在沒有被告在場的法庭上宣布了上述判決。

這個判決不僅在日本人民羣衆之間，而且還在國際上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中國、蘇聯、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意大利、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美國等國家的工會和擁護人權的團體或個人對法院提出抗議及鼓舞被告的信件和電報堆積如山。特別是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以及其他團體還捐贈了三百七十萬日元的救濟資金（一九五一年九月）。不待說，全体被告向仙台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訴。第二審從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開庭，在這法庭上，不僅有“自由法曹團”[⊙]，而且有當地仙台律師會全体會員主動參加法庭辯護團負責辯護。仙台律師會中的自由黨仙台地方幹部和屬於社會黨的人，儘管政治思想立場不同，也都參加了辯護。這表明了只要在法律上還有一點良心的話，任何人都不能默視這種虛構捏造的事件了。在日本及全世界輿論的抗議浪潮中，高等法院鈴木審判長終於承認了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告的原判具有嚴重的缺陷，不僅要審查文件（第二審通常是僅僅重新審查原審文件），而且還要由高等法院本身重新審查事實。

於是，福島地方法院和檢察廳的極為離奇的行爲就陸續被揭露了。例如，福島地方法院隱藏了最重要的物証——從鐵軌上拆下來而被扔掉的接縫鐵板。關於這個事實，當辯護團追問檢察官和警察時，他們撒了許多謊，但佐藤巡警終於不能掩蓋謊言，在法庭上供出了撒謊的事實。更驚人的是，福島地方法院審判長長尾隱藏着關於高橋被告的重要証件。高橋被告在數年前折斷了腰骨，腳不能完全伸開。但根據檢察官的控告以及原判決書，則誣指被告高橋曾跑步往返於從他的住宅至列車傾覆肇事地點來回有五里路的山道，而且是在雨後的泥濘道路上（以

⊙ “自由法曹團”是日本進步律師的團體。——譯者

一里路跑步三十三分至三十八分的速度)跑步往返的。長尾審判長曾向爲高橋治療的新潟医院及福島医院發出公函詢查關於高橋的身体情况。兩個医院对此均曾以公函答覆，証明高橋被告難於步行五里路。然而審判長却隱藏了該診斷書。此外，还揭露了所謂犯人曾用过單口螺絲鉗和活口螺絲鉗以及其它許多矛盾和謊言。

松川事件第一審強制施用了捏造誣陷，即使以資產階級的審判來衡量也不能稱之爲審判。這不僅是對二十名被告以及共產黨、工会的鎮壓，而應該說它是敵視人類和文明的嚴重罪行。這表明了日本統治階級和它的主子是怎樣地急於執行戰爭和殖民地法西斯主義政策。同時也表明了，它們的陰謀因遭到了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們的反对而日趨破產。

三 反法西斯鬥爭

任何鎮壓，任何破壞工作以及任何司法上的威脅，都不能掩蓋走上殖民地化的日本現實矛盾的發展，也不能制止人民的覺悟。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的鬥爭，隨着鎮壓的加緊，開始發生了質的變化。很久以前，美軍憲兵和日本警察就出動干涉勞動爭議和農民鬥爭，進行非法拘捕，揮舞棒棍襲擊羣衆；特別是對於旅日朝僑，滿不在乎地用手槍打死他們，但是對一般日本人，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还不曾這樣做。然而，它們現在對上述東日本重工業公司進行整肅赤色分子時，企圖以吉普車軋死工人；而這時期對電業公司進行整肅時，警察隊竟用手槍亂射手挽手的工人並使他們負了重傷。這是兇惡的白色恐怖在性質上的激變。並且它們每當向農村徵購糧食或當農民爲反对徵稅而進行鬥爭時，就立刻動員了警察隊。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和農民也就不得不採取自衛措施，而且已經開始實行了。這種自衛組織雖然在工人方面還是罷工時所

組成的臨時性組織，並非永久性組織，但在農民鬥爭方面，自一九五一年初就在不少貧農居多的地區，特別是在山村或開拓地區自發地產生了半常設的自衛組織。當時以農民鬥爭的領導者聞名的山口武秀寫道：農民已因徵購糧食或徵稅而一年到头始終遭到政府的暴力鎮壓，在這種情況下，“新的農民鬥爭就是農民反對政府掠奪的自衛鬥爭。這種掠奪是以殘酷的鎮壓政策為武器而強制實行的。因此，農民鬥爭組織……就必須具有甚至於在基層小組也能夠制止敵人的攻擊並加以反擊的那種準備和行動力量。這種組織就是以村落為基礎的經常性的農民防衛體制。在這裏將孕育着作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者運動的政治覺悟，並進而產生真正鞏固的自衛體制。”（“前衛”雜誌，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五十五號）。

隨着重新武裝和美軍軍事基地的擴張，土地被掠奪的事件遂不斷發生。特別是把戰後數年來真正由農民流血流汗所開拓出來的原軍用土地，再奪回去作為軍用地的時候；或如以上所述，美國為了把日本糧食作為統治南朝鮮的工具而強迫農民虧本供應徵購的時候，每遇這種情況，直接受害者自不必說，連看到和聽聞這種情況的農民，特別是貧農，也都把對和平與獨立的要求積壓在樸實的農民的心裏。當然，有一天這種心情勢必會要爆發的。

不僅是美軍直接管理的軍需工廠的工人，幾乎所有的工人每天都在親身體驗到日本殖民地化、軍事基地化的禍害或遭受這種禍害的影響。因此，他們首先不得不為工資、為生活而起來鬥爭。甚至曾徹底進行過整肅赤色分子並已相當變為御用化的工會，從一九五〇年底的年終鬥爭至一九五一年之間，也興起了爭議的浪潮。一九五一年二月，以著名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武藤為委員長的日本煤礦工會同盟，也不顧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科長艾米斯關於停止罷工的勸告，以要求提高工資為中心要

求，堅決舉行了總共二十天的全國性罷工，並獲得了勝利。这次大規模的罷工造成了八十万噸煤炭的減產和二百一十萬勞動日的損失。勞動爭議在五月以後，仍然沒有趨於退潮。其中，如一九五一年三月到六月的港灣工人鬥爭，還明確地提出反戰目標而進行了鬥爭。

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在大阪港，當輸往朝鮮的大米裝上軍用船勝利號時，一個工人在搬運大米的工作中使用了“手鉤”，於是在艙口的全部工人，都被監視他們的美國兵用舊時日本式的槌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由於这次事件，使搬運工人爆發了他們的日常不滿情緒，並激起了他們的民族意識，於是要求賠償損失和要求增加不使用帶鉤工具的津貼。三月三十日，全港灣工會的富島分會提出增加工資以及其他要求而舉行了無限期罷工，其他各分會為反對武裝警察的鎮壓也相繼進行了罷工。四月六日，全港灣工會大阪地方本部發表了包括如下要點的鬥爭宣言：“这次鬥爭是要粉碎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和重新武裝，我們決不能落後於具有輝煌鬥爭傳統的世界港灣工人，我們發誓要站在日本全國工人的前列而鬥爭”。這個鬥爭宣言得到了大阪港各工會的響應，成為有一千名自由工人參加的廣泛鬥爭，繼而並擴大到神戶、名古屋、四日市、東京、北海道、門司等全國各地。其間，在名古屋還發生了表現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的事件，即碇泊於名古屋的美國船舶“海怪”號的兩名船員曾訪問日本工會並捐獻了三千日元的鬥爭資金。在室蘭港，工人在罷工結束後也故意把搬上岸的物資拋棄掉或擲入海底（“前衛”雜誌，一九五一年七月，第六十號）。

反對戰爭、反對殖民地化鬥爭的幼芽，也開始生長在統治者的堡壘——警察後備隊中。他們喊出了“拒絕被派到朝鮮去”、“反對充當僱傭兵炮灰”和“槍口不向日本人”等口號。駐紮在善通寺的警察後備隊內部的民主組織發行了機關報“鼓翼”，據說

这是爲了与官方同名報紙“鼓翼”相对抗的(“前衛”，第六十号)。

正因爲工会的態度是如此的，所以社会党的左右兩派也不得不打出媾和四原則(全面媾和、永久中立、反对軍事基地和反对重新武裝)的招牌。不过，在他們之中，認真想遵循四原則的人究竟有多少还是個疑問。

不过羣衆鬥爭的高漲勢必在“總評”中也要有所反应。这就是說，正当美軍總司令部、吉田政府和工賊們看到“總評”已變爲日本工人運動的最大組織，認爲已如願以償而興高采烈的時候，“總評”的“左派”因素也同時增加了。因爲，“總評”既然因結了三百万人而成爲工人階級的中心組織，工会幹部也就必然地要反映工人階級的情緒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九五一年三月舉行的“總評”第二屆大会爲首，以及自一九五一年四月到七月間舉行的幾乎所有的主要工会的定期全國大会，一律决定了主張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裝和反对軍事基地的政策。如上所述，“愛國工人運動”(反動組織——譯者)的根據地國營鐵道工会也推翻了“愛國工人運動”所製定的方針，而確認了“媾和三原則”。大工会方面，只有日本煤礦工会同盟通过了武藤等社会法西斯主義者執行部所提出的“不得不及早与多數國家媾和”和“不得不要自衛权”的提案。但是這個提案也曾遭到北海道以及其他方面的激烈反对。該執行部的提案在最初表決時，因九十三票对九十三票(保留及棄权各五票)未能通过，第二次表決時，才以一百零一票对九十七票(保留一票)勉强通过了。由於右派幹部如此橫蠻地操縱大会，於是日本礦山工会也用舉手方式通过了“及早与多數國家媾和”的決定，但是熊本縣礦山联合会和嘉穗礦山联合会反对總部的變爲御用工会的方針而終於脫離了日本礦山工会。除了这些少數的例子之外，大部分工会都通过了主張全面媾和和反对軍事基地的決議。不僅如此，如日本教職員工会、全日本汽車產業工会、全國港灣工会同盟和全國瓦斯

工会联合会等組織，就沒有採納“總評”和社会党的關於“永久中立”或“与共產党劃清界綫”的方針；有的工会則对上述方針不置可否；有的工会就積極地提倡“与所有的階級政党及工会携手合作共同進行鬥爭”。

如同上面所引用过的，“總評”事務局長高野实在一旦承認“總評”係美軍總司令部的“天賜的兒子”之後，曾自誇“總評”的轉變說：“当‘總評’開始批判根據杜勒斯的意圖的对日媾和時，它們（美軍總司令部和政府）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以為孵化出來是雞的卵，結果孵出來的是鴨子，那末它們当然是不会容忍这种味道的”。这自然很好。然而，即使高野实滿足於做鴨子，可是工会會員和日本人民羣衆却不期望“總評”味雖不如雞，但實際上同樣是被帝國主義吞食的鴨子，而期望“總評”成爲咬住帝國主義並打倒帝國主義的老鷹或兀鷹，事實上，它也在如此變化之中。

独立与和平不僅只是進步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要求，實際上是与全体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密切有關的要求。正因為如此，甚至在地方選舉中，即在保守反動勢力憑藉“地盤”和“皮包”並壟斷了一切宣傳工具因而處於有利地位的鬥爭中，例如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舉行的千葉縣縣長及參議院議員補缺選舉中，又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舉行的廣島縣縣長選舉中，一旦以要求全面媾和、反对軍事基地爲口號，提出了統一候選人而進行鬥爭時，也就能够把自由党長期以來的“金城湯池”都推翻了。同時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要求全面媾和和反对重新武裝的投票，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爲止，已達約一千万票，組成了數百個“保衛和平會”；而截至一九五一年四月爲止，在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名的已有六百三十万人。当然，这些成績与日本的客觀形勢相比較，还是很不够的。因此也就沒有能够粉碎“單獨媾和”。但是，这种力量至少已使美國佔領者感到不便繼續公開佔領了。